

中国革命中的 共产国际人物

于俊道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革命中的 共产国际人物

于 俊 道 编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汪伊举

封面设计：张智彬

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 于俊道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125 插页4 字数180千
1986年6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650册

书号：11118·226

定价：1.45 元

· 作 者 的 话 ·

多年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由于缺乏资料和其它种种原因，国内学术研究开展得很不够。近年来，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开始活跃起来，但由于资料不足，研究工作存在一定困难。为了给党史研究工作者和党史教学工作提供一点参考资料，我们编写了《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这本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是一部资料性的人物介绍书籍。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作比较客观地介绍，不过多地评论；引用史料力求准确；吸取了近年来一部分同志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介绍方法，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叙述。由于这些人物的历史活动在中国革命的某一历史时期相互密切联系，而书中对每一个人物的这些活动又都作了介绍，所以就有一个重复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力图根据每一个人物在当时所处的地位和他所起的作用，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作了介绍，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相互联系。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以及有关重要人物，人数不少，我们只根据现阶段手中所掌握的史料，选择介绍了其中的十九位人物。他们是马林、王者

飞、王明、加仑、加拉罕、任弼时、米夫、达林、李大钊、张太雷、李德、张国焘、罗易、罗明纳兹、维经斯基、越飞、鲍罗廷、蔡和森、瞿秋白等。这十九位人物中，中国共产党八个，为了紧扣主题，我们只介绍了他们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代表有关的历史部分。国际人物有的不是共产国际代表，而是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苏联政治、军事顾问和驻华大使，因这些人在当时中国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故也作了介绍。目录的编排，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

此小册子于一九八一年底完成初稿，修改于一九八二年冬和八三年春。萧晓同志参加了小册子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由于目前国内出版此类书籍很少，所以我们的写作也仅仅是一个尝试，加之掌握的史料有限和水平较低，书中所写人物肯定还很不完善，因而难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于俊道

一九八五年春于北京

· 目 录 ·

作者的话·····	1
-----------	---

马 林·····	1
----------	---

王 若 飞·····	21
------------	----

王 明·····	25
----------	----

加 仑·····	43
----------	----

加 拉 罕·····	58
------------	----

任 弼 时·····	72
------------	----

米 夫·····	80
----------	----

达 林·····	104
----------	-----

李 大 钊·····	119
------------	-----

张 太 雷·····	129
------------	-----

李 德·····	141
----------	-----

张 国 焘·····	156
------------	-----

罗 易·····	172
----------	-----

罗明纳兹·····	200
-----------	-----

维 经 斯 基·····	209
--------------	-----

越 飞·····	232
----------	-----

蔡 和 森·····	238
------------	-----

鲍 罗 廷·····	245
------------	-----

瞿 秋 白·····	272
------------	-----

· 马 林 ·

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曾化名斯尼夫莱特、H·斯尼弗里耶特、斯里弗烈、布罗维尔、西门、菲利浦、马丁、安德烈森、马灵、倪恭卿、马伦、乐尔松、斯列夫利特、西蒙博士、菲利浦先生，^① 笔名孙铎，一八八三年出生在荷兰的鹿特丹。

马林在荷京大学读完政治经济学的有关课程后，^② 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九〇〇年就开始投身到荷兰工人革命活动中，成为铁路工会的一名斗士。^③ 一九〇二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从事铁路工会活动。一九一三年被派往荷属东印度群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爪哇的主要报纸《泗水商报》编辑部担任编辑工作。不久，又任三宝瓏商会的秘书。一九一四年初，兼任三宝瓏铁路电车工会机关刊物《坚韧报》主编。五月九日，在马林的倡议下，发起建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④ 之后，他又促使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与伊斯兰教联盟合作。

一九一五年，马林在爪哇用荷兰文创办了《自由呼声报》。^⑤ 一九一七年五月，辞去三宝瓏商会秘书工作职务，成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专门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一九一

八年，马林用印尼文创办了《人民呼声报》。^⑥十一月，他因多次撰写欢呼、歌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抨击荷兰政府反动的殖民统治的文章，遭到三宝瓏法院的逮捕和审讯。在法庭上，马林据理揭露荷兰殖民主义者反动统治的罪行，为自己无罪而辩护。荷属东印度反动当局于十二月五日将马林驱逐出境。^⑦一九一九年初，马林回到荷兰。

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以后，荷属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于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更名为印尼共产党。六月，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赴苏俄参加了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马林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的秘书。在七月二十八日召开的第五次会议上“讨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时，马林说：“我希望下次大会将有爪哇人和马来人与会并参加讨论。由于我的工作同印度^⑧的运动有七年之久的密切联系，所以我希望大会能重视我这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地区中所取得的经验。我认为，为了进一步发展世界革命，在整个日程中，其他问题都不如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这样至关重要。其余问题仅仅是工人运动中的争论问题”。对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罗易起草的补充提纲，马林认为没有“任何区别，它们的意见是一样的”。马林指出：“困难仅仅在于，如何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相互关系上，确定一条正确的方针。”马林建议把列宁起草的提纲用几种文

字向第三国际公布，特别要在中国、印度的革命者中散发。他还建议为远东和中东建立共产国际机构，并且特别恳切地呼吁共产国际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给予实际的帮助，比如接纳远东的领导人到苏俄学习共产主义的课程等。他并要求贯彻提纲中的有关主张，以便使远东能够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很有朝气的成员^②。在八月六日召开的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马林再次就东方革命问题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说，东方民族尽管目前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政党，但考虑到“东方对共产国际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所以我们同意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应该有一位有充分选举权的代表。但他又指出，中东和远东的情况很不相同，而我们的同志了解中东代表胜过了解远东代表，“我请求给东方民族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代表”，中东和远东各派一个正式代表到执行委员会工作。^③

马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会后，马林接受了到上海考察远东各国革命运动情况、联系并调查是否有希望和可能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使命，但由于有别的事情耽搁而未能去。九月，马林参加了在巴库举行的东方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又到意大利和维也纳进行一段时间的工作，直到一九二一年四月，才动身前往中国。^④马林从欧洲取道苏伊士运河，乘意大利劳尔·特利斯提诺公司的阿奎拉号船，于六月三十日抵达上海，化名安得烈森，住在南京路大东旅社。但是，马林来上海前在维也纳时，就曾被逮捕，六天之后被驱逐出境。维也纳警察局把马林的护照交给外事局；外事局向马林将要去的国家统

作了通告。英国当局在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各港口城市对马林作了严格的检查。日本当局对马林的情况也都了解。荷属东印度政府同荷兰驻上海总领事取得了联系。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马林来华后再去朝鲜和日本的打算已不能实现，马林作为密使来华从事革命活动已不可能，迫使马林一到上海就必须立即到荷兰驻上海领事馆进行登记，从而完全以公开身份进行革命活动。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和荷兰驻上海领事馆对马林的行踪作了很详细地记录，并载入荷兰政府外交部的档案中。

马林到上海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解决中国共产主义者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他派遣了张太雷等年青同志赴莫斯科。马林同在北京的俄国代表以及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远东局取得了联系，从他们那里得知建立共产党的实际组织还未完成。为完成他的赴华使命，即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而联络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他到北京同李大钊同志交换了意见，并与北京的党员进行了会谈。此时，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尼柯尔斯基到达北京，以接替维经斯基的工作。马林、尼柯尔斯基同张国焘一道到上海与李汉俊等商量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马林与在广州的陈独秀也取得了联系。七月四日，马林从南京路大东旅社迁到麦根路三十二号公寓。^⑩

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等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马林介绍了他在荷兰殖民地爪

哇进行活动的经验，建议中国共产党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组织。根据马林的建议，大会决定选出一个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由于会议期间受到法国租界巡捕房包打听的搜查，马林很机警地通知大家马上休会，分途离开，使代表们免于被敌人抓捕。会议改在浙江省嘉兴县南湖画舫上继续举行。马林为避免引人注目，未出席后几天的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马林开始同上海国民党中央机关进行接触，会见了国民党党员张继，促使国民党人和中共党员一道组成三十多人的代表团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

八月，马林建议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厅的职务，回到上海专任党的中央局总书记工作。党中央随即派遣包惠僧前往广东接陈独秀到上海。这时，张太雷从苏联回国，担任马林的助手和翻译，并负责联络与组织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爪哇等亚洲国家的革命者选派代表赴苏联参加远东各族人民代表大会的事宜。张太雷奉马林的派遣，作为共产国际密使前往日本找到了施存统，并与德田球一、近藤荣藏等取得了联系。

八月底，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后，同马林举行了几次会晤，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对经济上的援助等问题，表示了不同意见。由于双方争执不下，陈独秀曾一度拒绝同马林等人见面。后在李达的劝导下，又开始进行接触，但“都是貌合神离”。^⑬

九月上旬，陈独秀等五人在上海法租界被反动派逮捕，

马林和张太雷等竭力进行营救，他们请法国律师巴和为陈独秀辩护，并用了一笔费用，才于三天后将陈独秀保释出狱，五天之后又将其他几人营救出狱。^⑭陈独秀出狱后，继续同马林进行接触，经过双方交谈，初步确定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一九二一年九月底至十二月上旬，马林居住在上海威赛德俄国人亚赞诺夫的寓中。十二月中下旬，马林经国民党党员张继介绍并在张太雷的陪同下离开上海，乘岳阳号轮船赴汉口；之后又从奥汉路南下，途经湖南前往广西桂林同孙中山会晤。马林在途经长沙时，出席了当地青年团的集会，并且用一个晚上的时间给他们讲解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等问题。与此同时，他还同湖南省省长及其顾问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⑮

十二月二十三日，马林与张太雷于薄暮时到达广西桂林，当晚住宿在广西银行。孙中山在他的住处，即距离广西银行不远的旧桂王府，^⑯与马林、张太雷进行了两次会谈。国民党主要人物邓家彦、许崇智、孙科、陈少白、林云陔、曹亚伯、朱卓文等也参加了这两次会谈。在会谈中，双方讨论了国民党与苏俄建立联盟的可能性。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情况，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项建议：组织一个能够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首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表示欢迎，并表示国民党与苏俄的联盟，在北伐吴佩孚的战役胜利结束后即可实行；目前愿与苏俄建立非正式的

关系，以免招致列强的干涉。此外，还讨论了群众运动、对工人的宣传工作等问题。孙中山向马林介绍了国民党的策略、历史、同太平洋各国华侨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国民党的帮助等问题。马林在桂林期间，还出席了当地青年团体举行的集会。马林与张太雷在桂林一共呆了九天时间。^⑩

一九二二年初，香港海员大罢工，马林与张太雷一同前往广州。他们在广州停留了十天时间，^⑪出席了广州和海丰青年们的集会活动。国民党对海员罢工的支持，给马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了解到国民党虽然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但对工人阶级这种革命运动的重要性尚不理解。马林同在广州的陈炯明还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陈炯明自称“社会主义者”，并表示支持苏俄革命。但马林发现陈炯明不如孙中山。陈炯明的民族主义，只局限于广东一省；而孙中山为了挽救整个中华民族的危亡，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着眼于全国。马林认为，孙中山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开展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能与之合作的人不是陈炯明，更不是吴佩孚，而是孙中山。

马林于二月三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三月七日抵达。马林的中国南方之行，是他在中国工作期间最重要的时期。通过这个时期的考察，他对国民党的性质和成分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马林感到南方的工人运动已经迅速发展，而上海的工人运动还没有开展起来。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要到国民党中去进行革命宣传，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国革命迅速发展。

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设想，正好同当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政策相吻合。为此，马林把促成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作为他在中国工作的主要内容。马林在上海逗留了大约两个星期后，便于三月十九日动身前往北京，向苏俄使团巴意开斯提交了给共产国际和苏俄外交委员会的两份报告。报告建议苏俄政府派出使者前往中国南方政府。建议后来被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所采纳。马林此时住在六国饭店。^①

三月二十九日，马林离开北京返回上海，开始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商谈国共合作问题。他建议共产党到国民党中去开展政治活动，同时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国共两党革命的宗旨以及所依据的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同共产主义很不相容。从国民党的广东以外的各省人员来看，仍是一个争权争利的政党。共产党假如加入该党，它在社会上的信仰将完全丧失，将永无发展的机会。由于孙中山与陈炯明有矛盾，共产党一旦加入国民党，又将受陈派的敌视，即使在广东也不能活动。孙中山素来对新加入的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因此，中共领导人主张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虽经多次商谈，仍然各持己见，意见未能得到统一。

一九二二年四月，中国共产党在杭州召开了中央全会，^②会议讨论了中国工人运动问题。马林建议中国共产党废弃关门主义政策，直接加入到国民党中去，以便于在

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但不放弃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在讨论中，因很多人对马林的意见表示了异议，因而未被全会所接受。

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采纳，于是他决定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以便取得共产国际领导的明确支持。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马林从上海乘日本轮船鹿岛丸号前往新加坡，又从新加坡途经马赛、阿姆斯特丹、柏林和雷维尔赴莫斯科，^②于七月上旬到达。行前，马林在上海撰写了〈远东通讯〉和〈一个流浪者的信〉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同年五月八日的〈论坛报〉与〈自由世界〉第十二期上。

在马林离开上海前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前，陈独秀曾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和六月三十日两次写信给维经斯基，要求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反映他本人的意见，说他不同意马林关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信中说：

“联合国民党的问题已在广州、上海、北京、长沙和武汉的会议上讨论过，无论在哪里它都遭到断然反对。事实上，加入国民党万不可能”。^③信中还表示有亲自到莫斯科申述的急切愿望。

七月十一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具体地叙述了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了解和认识，对中国革命问题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议。他在报告中说：中国现代产业工人人数很少，农民对革命漠不关心，尚未表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因此，目前时期中国没有一个发

展了的阶级能够担负政治领导。他着重分析了国民党，说国民党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它的成份很广泛：一是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如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二是旅居国内的华侨，这是国民党内的资本主义因素；三是南方军队中的士兵，他们生活在逆境，地位低下；四是工人，仅在广州、香港、汕头等地就有一万二千名海员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纲领能使其它不同的团体加入进去，并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马林的报告中还提出，共产党必须和国民党合作，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如果不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开展宣传工作的前景是暗淡的。此外，他建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由上海移到广州，在那里公开进行工作。^②

共产国际对马林的报告作了肯定，在《共产国际通讯》第一百四十五期上刊登的文章认为，马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通过透彻的研究”，“对这个大国的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马林的报告看不到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伟大力量，而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上。马林的这种错误观点，对共产国际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种轻视共产党，重视国民党的观点，有着重要的影响，对陈独秀右倾思想的形成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七月十八日，共产国际决定接受马林关于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和把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广州的建议后，作了《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要求马林的所有活动必须

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的决议为基础。并且还指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共产党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这个团体的建立要尽可能得到国民党的同意，但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个指示打印在马林的衬衣内秘密带往中国。七月二十四日，马林被任命为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社的远东通讯员，任命书于当日由卡尔·拉狄克签署。

在莫斯科期间，马林得知越飞已被任命为苏俄驻中国的特使，并且很快就将赴华，于是他们便一道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初从莫斯科到达北京。越飞在北京取代巴意开斯，同北京政府谈判，马林则前往上海，从事统一战线的工作。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七日至十八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了特别会议，即第二次西湖会议。马林参加了会议。他传达了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这次会议虽然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赞成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但大多数人员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的问题，则十分怀疑。因此，这个会议以后，只有少数几个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

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在广州炮轰总统府，公开背叛孙中山。孙中山离开广州，八月十四日到达上海。八月二十五日，马林在上海法租界与孙中山进行了会见，会见时，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他去莫斯科的情况和共产国际的决定。经